

易礼容在中国劳协的战斗岁月

石绍庆

加入中国劳动协会，开展进步活动

易礼容（1898—1997），字润生，号韵珊，湖南湘乡县人，1919年加入新民学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沙文化书社经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代书记。大革命失败后，易礼容被反动派通缉，转入地下斗争。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易礼容去江苏省委任农民部长，由于去江苏路上时间长，险情屡屡发生，他遂与中共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4年，经沈钧儒等介绍，易礼容同朱学范相识。1935年，中国劳动协会在上海成立，朱学范被选为常务理事。中国劳动协会（简称劳协）成立初期是一个受国民党控制的劳动文化团体，后在朱学范等为代表的进步人士的推动下，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质的工会组织。这一时期，尽管易礼容没有进入劳协的核心领导层，但他依然坚守革命初心，力所能及地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上海沦陷前，易礼容还竭尽全力掩护中共党员成功脱险，将王凌波（曾任延安行政学院副院长）从龙华监狱中保释并设法送往延安，帮助张浩（即林育英，曾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从上海出国。

1936年8月，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听闻易礼容在上海的事情后，专门写信和他联系。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易礼容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给予高度评价肯定，并期待他能够为工运统一事业做出努力。

1938年初，易礼容与朱学范在香港会面，朱学范计划同易礼容商量如何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在1939年中国劳动协会第二届理事改选后，易礼容当选为监事，此后又当选为常务理事。1943年3月，劳协在重庆改组，选举易礼容担任秘书长，加强了劳协内部进步的领导力量。此后，朱学范经常往来于欧美各国参加国际劳工组织会议，劳协日常工作基本由易礼容负责。

任职期间，为改变劳协内部组织结构，加强进步力量，易礼容亲自兼任组织股股长，吸收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担任组织干事，从工人中发展个人会员，使劳协群众基础更加广泛。同时，易礼容还积极组织广大工人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帮助沦陷区技术工人内迁、救济湘桂区撤退工人、发动工人出国参加抗日作战，创办工人福利社、劳工医院、劳工补习学校、劳工托儿所，出版《中国工人》，捐款资助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福利事业。

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在百忙之中仍不忘与易礼容相见叙旧。有一次，毛泽东与王昆仑、许宝驹等民主人士会谈时，特意提出：“你们能不能通知易礼容先生？我想看看他。”在王昆仑等人的协助下，易礼容与毛泽东终于会面。9月10日，易礼容和朱学范到

1948年8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中国劳动协会以团体会员加入恢复重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标志着革命战争年代下长期处于分割状态的中国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实现了团结统一。在这一重大历史进程背后，时任中国劳动协会常务理事兼书记长的易礼容，为实现中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 20世纪30年代的易礼容



重庆桂园再次与毛泽东会面，毛泽东在听过中国劳动协会情况介绍后，郑重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们。”

协助邓发出国，参与组织发表“二十三条”

1945年6月，世界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于9月在巴黎召开。时任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的邓发致电朱学范，表示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决定派人出席大会。随后，朱学范与易礼容进行研究，决定全力帮助解放区代表参会。最终，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朱学范、易礼容的不懈努力下，确定由邓发代表解放区出国参会。

1945年9月，邓发出国途经重庆时，易礼容专门在重庆市工人福利社举行茶会欢迎。邓发出国手续，一切均由易礼容安排人员办理。临行前，易礼容还组织部分劳协干部到机场为邓发送行。9月23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张晚梅致信易礼容，称邓发在印度加尔各答转机时因故等候多日未能成功，希望劳协设法保障其顺利抵达欧洲。收到信后，易礼容立即做出安排，分别致电邓发、朱学范与加尔各答中国领事馆。在易礼容的协助下，邓发顺利抵达欧洲出席世界工联第一届代表大会，在会上代表中国工人提出“八项政治主张”，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热烈支持。

回到重庆后，朱学范与易礼容商量劳协的政治主张，确定由易礼容主持，在邓发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基础上，起草了《中国劳动协会对当前政治

的要求和主张》，也称“二十三条政治主张”。经邓发同意后，“二十三条政治主张”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发表。

争取和平民主，与反动派坚决斗争

1946年1月31日，“旧政协”会议闭幕。为庆祝政协会议的成功，中国劳动协会及重庆各界进步团体决定于2月10日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大会当天，国民党特务公然将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及劳协会员60余人打伤，制造了震惊世人的“较场口惨案”。

得到消息后，易礼容不顾个人安危，立即组织劳协干事赶到大会现场协助维持秩序。为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易礼容主持起草劳协《告全国工友书》，表达劳协坚持斗争的决心。他还指示劳协成立“较场口血案”工人后援会，将反特务暴行与推动工人运动相结合，组织力量分头到各厂矿向工人揭露特务暴行，组织工人捐款慰问受伤民主人士。

劳协的这些进步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946年8月6日，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悍然“接收”重庆工人福利社、劳协分会等机构。易礼容与朱学范公开对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提出抗议，指出：“重庆市工会究以何种法律为根据，得侵夺与妨碍本会重庆各事务机构之财产与业务，而竟妄称‘接收’；对学范、礼容攻击之点，该会既列举十类之多，亦应逐一提出证据，公

开证明，否则捏词诽谤，应负刑事责任。”

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群众》杂志及其他进步报刊进行声援。在国际上，国民党当局同样受到了舆论谴责。国内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大大超出国民党当局的意料。在多方斡旋之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退还被“接收”的机构，释放被捕人士。但国民党重庆地方法院却通缉易礼容，并请四川高一分院转呈司法行政部进行通缉。易礼容被迫离开重庆，辗转数月抵达香港。

转折年代，跟着共产党走

1946年11月，朱学范抵达香港后，即与易礼容商量今后劳协何去何从。易礼容提议请朱学范与刘宁一（时任解放区职工联合筹备委员会主任）详细谈一谈，听一听中共中央的意见。朱学范根据刘宁一的建议，由易礼容亲自起草劳协迁往香港的声明，于11月20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

在中国共产党驻香港办事处帮助下，易礼容很快就将劳协总部在香港建立起来，在上海的部分劳协干部也在中共地下党掩护下来到香港。1947年底，易礼容向章汉夫提出请解放区工会派干部到劳协总部工作，经当时在香港的刘长胜（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同意，派沈德华以主任秘书的名义协助易礼容负责劳协日常工作。

1948年8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关于中国劳动协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名单，朱学范在征得易礼容同意后，提出由朱学范、易礼容、张光岱、顾锡章、徐政等10人组成。因工作关系，易礼容等6人未能参加大会。尽管易礼容未能出席会议，但他仍被选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并在此后召开的执委会上，先后当选为常务执行委员、劳保福利部部长。

1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会致电易礼容，委托他通过积极分子在上海工人中进行各种可能的工作。1949年1月7日，易礼容电复陈云、李立三、刘宁一、朱学范和全总常委，汇报了工作开展情况与具体计划。3月5日，全总常委会再次致电易礼容，称：“一切工作均望按照常委前电原则谨慎进行。”此后一段时间，易礼容按照全总常委会指示，对上海、重庆等国统区的工人运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9年4月21日，朱学范在李立三的陪同下，到北平香山会见刘少奇。会谈中，刘少奇详细询问了劳协还有哪些人在香港，哪些人在国统区。当得知易礼容还在香港时，刘少奇连声说：“那叫他快点来吧，来吧，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嘛！”不久，中央统战部致电易礼容，邀请他到北平。同年7月，易礼容在北平参加了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并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11月，中国劳动协会在北京召开代表会议，宣告自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为彻底实现全国工会运动在组织上的完全统一，决定停止一切活动。易礼容作了工作报告。
(作者单位：中华全国总工会)

史海观澜

SHIHAI GUANLAN

中央红军“切尾巴”之战

吴小龙

1935年，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甘苏区西部的吴起镇，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胜利会师，并在此打响著名的“切尾巴”战役。

当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国民党军骑兵部队便尾随而至，如同甩不掉的“尾巴”。随第一纵队率先抵达吴起镇的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并立即电令彭德怀前来，又找来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讨论作战方案，决定由彭德怀部署和指挥这次战斗。

10月21日黎明，红军兵分三路，隐蔽在五道沟的头道川、三道川和正面的西南山，形成三面夹击态势，并派红军干部团示形于敌、诱敌深入。战斗指挥所设在平台山的杜梨树旁，从这里可以俯瞰各处战事。凌晨4时，毛泽东登上平台山，在一棵杜梨树下又召开了一次战前动员会。他反复强调打好这一仗的重要意义，要求一定要打胜。

战斗于上午7时打响。先是国民党宁夏马家军的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同红军干部团5连一部交火之后，一路杀向吴起镇，不久便进入塔儿湾。彭德怀立即下达了攻击命令。顷刻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火光闪闪，打得敌军骑兵纷纷落马，残部狼狽逃窜。随后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七师赶来支援，又

迅即被打乱，掉头逃命。红军立即乘胜追击，利用土岗深沟的地形优势，采取分块切割、相机包围的战术，把敌骑兵分别包围在二道川、平台山，头道川的杨城子、圪塔梁、柳树梁、燕山梁一带，给予毁灭性打击。激战到9时许，红军全歼敌1个骑兵团，击溃敌3个骑兵团，毙伤敌军700余人，俘敌1000余人，其中有马术教官、兽医和会钉马掌、修马鞍子的工匠，补充了红军新建的骑兵队；同时缴获战马1600多匹、迫击炮、重机枪等一批武器装备。

为了支援红军，当地群众不分白天黑夜集中大批粮食和生活用品，人背驴驮，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形成了多支川流不息的送粮大军。当地百姓看到红军战士在陕北寒冷的时节依然身着破旧单衣，就组织上百位毡匠为红军赶制了一批毡衣和毛被套，许多妇女也放下家中的活儿连夜为红军制作衣服、鞋袜。当地游击队、赤卫军队员和群众主动为红军当向导带路，准备和架，做转运伤员工作，协助红军掩埋牺牲战士，转运缴获战利品。

吴起镇“切尾巴”战斗结束后，红军分别在10月21日下午和10月22日，与当地游击队、赤卫军、老百姓举行盛大的庆祝联欢会。为了纪念“切尾巴”战役的胜利，当地群众将平台山改名胜利山。

史海观澜

SHIHAI GUANLAN

被誉为“忠烈可风”的抗日英雄

梁银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共产党、八路军果敢深入敌后，领导河北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遏止日军持续进攻的生力军。在共产党人、八路军的领导下，大批河北热血青年纷纷响应号召，投身抗战。时任小学教师的临城县鹿庄村青年马志强，投笔从戎，参加了共产党、八路军创建的临城抗日县政府，以饱满的热情投身抗战工作，因成绩卓著，很快被县政府任命为二区副区长、代区长、副县长。

1942年，日伪军对临城县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扫荡”和蚕食。日伪军为破坏临城抗日，修筑了一道一米多宽、一丈多高的封锁墙，临城县抗日二区被封锁在大墙以东，成为新敌占区。马志强当时已遭到敌人的通缉，但仍坚持带领干部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往来于封锁墙两侧，继续主持二区的抗战工作。当时，县政府为集中力量，决定将分散在二区各村的枪支弹药迅速转移到根据地。为完成上级组织交给的任务，马志强每日夜回带领区干部、战士穿越峭壁林立的封锁墙，深入敌占区，秘密转移枪支弹药。一天，马志强带领10余名战士潜入二区瓮城村，接收当地埋藏的武器，因武器较多，白天没有完全取出，当夜他们便露宿在瓮城村外的山里。夜间，周边据点的日军在汉奸的指引下，突然将他们包围。马志强临危不乱，自己带上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战士边打枪边向山上跑，将敌人吸引过去。趁此机会，战士们背上枪支弹药，迅速跳出了敌人包围圈。马志强

两人则与敌周旋至天亮，各毙伤敌人一名，并成功躲过敌人的搜捕，安然脱险。

1943年7月，因连年灾荒，人民群众生活极度困难，马志强不顾危险，坚持深入敌占区开展救灾工作。一天，他带领几名同志到敌占区救灾进行慰问，为村民发放抗日政府提供的救济粮，其行踪被汉奸侦知。日军立即调集大队人马，包围了山村。马志强命令村干部掩护群众转移，自己率领7名战士出村迎敌，拖住敌人，为转移争取时间。马志强等和敌人激战两个小时，由于敌众我寡，7人中有两人牺牲，马志强和其他同志受伤被捕。

日军抓住通缉已久的马志强后喜出望外，审讯中，“承诺”只要供出抗日组织情况，可当伪县长，被马志强一口回绝。敌人恼羞成怒，对马志强严刑拷打，马志强宁死不屈。一天，牢房里被关进来一名“八路军战士”，和马志强及狱友们“拉家常”，其询问临城县抗日政府的情况。马志强察觉出此人是汉奸装扮的，当面揭穿了他。敌人见诡计破产，决定将他公开处刑，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他们把马志强押到村口，绑在一棵大树上，轮番用皮鞭抽打，并强迫群众围观。马志强视死如归，用尽力气向群众高呼抗日口号，直至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4岁。

马志强牺牲后，中共临城县委和抗日县政府根据马志强的英雄事迹，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临城抗日军民为他立碑纪念，上书“忠烈可风”四个大字。八路军宣传部门把他的事迹编成戏剧，在各抗日根据地巡回上演。

史海观澜

SHIHAI GUANLAN

打破敌人“永久驻防”仅用五天

佟雪辉

1940年12月5日，驻山东省掖县县城的日军1个中队和伪军两个连，携带水泥、钢板等建筑材料，向郭家店进攻。郭家店位于大泽山东北，地处八路军平招掖根据地中心，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敌人一到郭家店，就威逼群众修炮楼、工事，并且贴出布告，声称要在“永久驻防”。

针对敌人这一行动，胶东八路军研究决定，坚决把敌人赶出郭家店，并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五旅在短时间里完成了战斗部署，于当天夜里即派出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对郭家店日伪军进行袭扰，阻碍其构筑工事。

6日晚，五旅十三、十四团隐蔽接近郭家店，在群众的带领下摸到敌人驻地，迅猛发起攻击。日伪军仓促应战，被迫退至村北几处院落内，并施放毒气。五旅由于没有对付毒气的经验，于7日拂晓撤出战斗，继续对敌实施包围。郭家店所在的掖县抗日自卫团和群众闻讯后也纷纷组织起来，配合五旅破坏敌人通讯设施和公路，为子弟兵传递情报、运输给养、救护伤员。

派出小股部队突围向掖县县城敌人求援，十四团一部埋伏在庙埠河附近的山头上，出其不意地伏击了这股敌人。8日晚，掖县地方武装又袭击郭家店敌人。经过4昼夜的袭扰和打击，敌人已疲惫不堪。9日黄昏，八路军第五旅再次进攻郭家店。十四团三营从村西发起猛攻。进攻前，指挥员要大家用毛巾沾上水，再沾上草木灰，捂住鼻子，以防敌人的毒气攻击。经过激战，日伪军死伤过半，残敌退到村北一个小院子里负隅顽抗。10日晨，掖县县城日伪军100余人驰援郭家店，遭十四团打援部队伏击，死伤惨重，残敌窜入郭家店后，会合被困日伪军于黄昏突围，准备连夜逃回掖县，沿途又遭五旅阻击部队和追击部队的攻击，溃不成军，残敌在掖县敌人的接应下侥幸逃生。

此次战斗，胜利粉碎了日军在莱州郭家店安设据点、蚕食以大泽山为依托的平招掖根据地的图谋。据统计，山东纵队第五旅此次共毙伤日伪军140余人，俘日军2人、伪军36人，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数十支以及许多大衣、毯子、钢盔、罐头等军需物资，值得一提的是，五旅还缴获了不少日军慌乱中遗弃的部分文件和信札，从中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

红六军两打郝穴

贾晓明

编后拾遗

BIANHOU SHIYI

1930年2月5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洪湖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的指示精神，中共鄂西特委将鄂西红军独立第一师两个纵队扩编为红六军。7日，红六军誓师出征，击溃“清剿”之敌，两个月之内连下多处重要城镇，消灭了大批敌人，兵锋直指郝穴。

郝穴距荆州城90里，依江傍湖，上控荆(州)沙(市)，下据监(利)石(首)，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军独立第十四旅旅长彭昭贤以400余地方常练队据守在这里。中共江陵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沙市以下的广大平原湖区已成为有效管辖地域，而郝穴仍为敌人所盘踞，是根据地内的一大隐患。为此，红六军决定消灭郝穴之敌。

地下党的帮助下潜入郝穴，摸清了敌人的驻防情况。7日夜，红六军兵分三路南下，秘密抵达郝穴外围，完成包围。8日拂晓，红军突击队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突入镇内，赤卫队和革命群众肩扛红旗，手持大刀、梭镖，呐喊助威。守敌不知虚实，顿时乱作一团。红军很快突破敌人的防线，9日上午9时，战斗结束，红军共歼敌400余人，缴枪200余支，另有不少敌人为了逃命，跳入长江淹死。

红军夺取郝穴，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当局。不久，国民党独立十四旅趁红六军转战外地，派第二团侵占郝穴。4月下旬，敌十四旅第二团又以一连攻占郝穴以东20里的苏区腹地重镇普济，形成对革命根据地的直接威胁。

为拔除敌人“楔入根据地腹心的两个钉子”，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红六军和县地方武装制定出了“强攻普济、巧取郝穴”的作战方案。

成包围。在镇内党员的配合下，先消灭了敌军岗哨，又消灭了守城门的敌兵。随后，红军冲进城里，发起猛攻，很快全歼守敌一个连，击毙敌连长。国民党独立十四旅旅长彭昭贤闻讯后，派副旅长率第一团的两个营赶到郝穴，同第二团的两个营汇合，计划分三路夺回普济，三路敌人定于5月28日凌晨同时赶到普济外围后，同时发起进攻。

在地下党组织的多方侦察下，红六军掌握了敌人围攻普济的计划以及军事部署、行军路线。经研究，红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暂时放弃普济，将进攻敌人引至普济以东的拖福寺，逐一歼灭。为了打好这一仗，中共江陵县委派集县、区赤卫队参战，并组织数百人的担架队救护伤员。

5月28日凌晨，西、南两路之敌三个营会合后，在进军路上遭到红军小部队阻击。红军且战且走，迅速向普济以东退去。敌人追到普济，发现是一座空城，于是留下一个营入城“清剿”，修筑

工事，其他两个营继续尾追红军。当敌人进入拖福寺以东时，突然遭到红军的围攻，被打得措手不及，顿时死伤大半，残部拼命突围逃走。

北路之敌听到枪声后向战场急进，抵达雁雁桥时，却发现木桥已被赤卫队拆除。这股敌人企图抓民夫架桥，但周边群众早已坚壁清野。敌人正在慌乱之际，红六军突然从其背后杀来，敌营长派出两个连抵抗，自己带着一个连率先逃跑。失去指挥的敌人很快被红军歼灭。红军俘敌80多人，缴获机枪4挺，步枪100余支及大批弹药。

遭到红军打击的各路残敌溃不成军，纷纷逃入普济城，妄图凭借工事做垂死挣扎。红军追击到普济城下，将城包围，并发起猛攻，却遭到街头堡和城壕里敌人火力的压制，敌我暂时呈对峙状态。突然东南风起，红军乘势点燃普济东街驻扎敌军的民房（战斗胜利后红军照价赔偿），并网开一面，放松了对西门的封锁。敌军害怕葬身火海，仓皇打开西门向郝穴方向逃窜，哪知红军早已在路上设下埋伏。敌人在逃窜中，沿途不断遭到猛烈伏击，死伤500余人，重武器基本遗失，剩下的200多敌人好不容易逃进郝穴，却被部分化装的红军战士跟随潜入镇内。不久，大队红军追击到镇外，与潜入镇内的红军战士里应外合，很快消灭了残敌，一举再克郝穴。